

吳介民、廖美，2016，「佔領，打破命定論」，收錄於林秀幸、吳叡人主編，《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和視域》頁117-163。台北：左岸。

致謝：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吳介民，「『太陽花運動』への道——台湾市民社会の中国要因に対する抵抗」，《日本台湾学会報》第17号，2015年9月，頁1-37。作者感謝廖卿樺、黃佩君、施懿倫等研究協助，也感謝本文匿名審查者與兩位主編的修改意見。

## 占領，打破命定論

吳介民

中研院社會所  
副研究員

廖美

中研院社會所  
博士後研究

曾任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第三種中國想像》，主編《權力資本雙螺旋：台灣視角的中國／兩岸研究》，合編《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翻譯赫緒曼著《反動的修辭》。

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 (CUNY Graduate Center) 經濟學博士。研究興趣：勞動經濟、薪資與所得分析、年金與健保方案、拉丁美洲政治經濟，以及全球草根經濟創新運動。著作刊登於《思想》等刊物。

太陽花運動占領立法院長達二十四天，期間並短暫占領行政院。<sup>1</sup>這場占領不但衝擊臺灣政治樣貌，也影響多年來國共兩黨所主導的兩岸交流遊戲規則。

在太陽花運動之前，「中國因素」對臺灣的滲透和影響，早已深入經濟、政治與社會領域。雖然新聞界對中國效應時有報導，社運界經常抗議，學術界發表分析論著，但是大部分公民對此議題顯得「冷漠」或「無力」。因此，有人擔憂，臺灣在經濟上愈來愈依賴中國，而中國「以商圍政」的統戰策略猶如「慢煮青蛙」，一般人卻難以察覺；即便有所感或憂慮，整個社會仍充斥著「無力感」，因為臺灣在經濟上既已高度依賴中國，則對抗這個趨勢只會徒勞無功。這種態度即政治心理學上的「無效益感」(ineffectacy)，因而呈現聽天由命的態度。

然而，太陽花運動改變了臺灣社會對中國因素的「無力感狀態」。在整個占領期間，社運組織與公民團體積極參與這個運動；民意調查也顯示，這個運動獲得多數民眾支持，更在全國各地引發前所未見的關於「兩岸服貿協議」的討論熱潮，彷彿整個社會對中國因素，幾週之間，從無力感狀態被激活了。其實，從「無力感」到「激活」，並非突發的跳躍，而是經過一段漫長的醞釀，只因占領行動扮演著急速催化的角色。

本文將探討太陽花運動的前因後果：哪些因素讓社會大眾關心中國因素對臺灣的影響？學生與公民運動團體扮演什麼角色？哪些人支持太陽花運動？最近幾年臺灣民意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太陽花運動導致了哪些政治影響？以下先討論兩種結構主義決定論對臺灣國家前途的悲觀預測，做為問題意識起點，之後依序分析上述問題。

## 一、決定論命題

臺灣面對中國的主權宣稱與經濟吸納，一直處於守勢。臺灣在領土、經濟規模、軍事能力各方面，都遠低於中國，落入不對稱的結構關係中。臺灣位於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從冷戰時代以來，持續依靠美國的安全承諾。然而，隨著中國崛起，以及臺灣經濟與中國發生愈來愈深的依賴關係，使得臺灣做為「事實獨立國家」或「政治實體」的地位，日漸受到侵蝕與挑戰。

因此，臺灣在處理兩岸關係、以及美中臺關係，面臨的根本難題是：超過半世紀以來，臺灣在安全方面高度倚賴美國，如今隨著國際與國內局勢的結構變遷，以及崛起的中國對臺灣愈來愈強烈的「宗主國」姿態與經濟吸納政策，臺灣是否可能擺脫、以及如何擺脫依附情境？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有兩種不同的理論思路，分別脫胎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世界

<sup>1</sup> 占領期間從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至四月十日。其中，在三月二十三日晚上至二十四日清晨，支持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和公民曾短暫占領行政院廣場、二樓部分辦公室、和右廂貴賓室等。

體系理論，以及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以下，討論兩篇評論臺灣現實局勢的代表性著作，將可清楚呈現問題。

第一篇是歷史學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他針對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對於臺灣民族主義性質之設想，提出限定與質疑。根據後者，臺灣的民族問題，基本上可以適用「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的詮釋架構。<sup>2</sup>然而，佩里·安德森認為，由於種種特殊歷史機緣，使得臺灣「在這門類裡與眾不同」<sup>3</sup>。在他所提出的幾個特殊性之中，最突出的是美國在臺灣海峽所扮演的角色：「臺灣個案的特殊之處是，主張獨立的國族本身，卻完全仰賴一個外在強權。過去一個世紀與大陸的隔離(separation)，塑造了臺灣的特定經驗，但這隔離一直是帝國的作用，而非針對帝國的反叛。……臺灣依然是美國帝國強權的保護國(protectorate)。」<sup>4</sup>佩里·安德森在文章最後說：「歷史地看，(兩岸之間)某種形式的重新結合(reintegration)，似乎是長遠進程中最有可能的結局。」

這個近乎命定式的歷史條件，在後冷戰時代，尤其是中國藉著市場經濟崛起之後，再加上兩岸之間懸殊的領土與人口對比，顯得咄咄逼人。

第二篇是政治學者約翰·米爾賽默(John Mearsheimer)的〈跟臺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從現實主義角度，預測崛起的中國終將成為東亞的霸權，足以排除美國的影響力，進而兼併臺灣；雖然不在今天、明年、或未來幾年的時間完成，但終究會在幾十年內發生。米爾賽默的預測乃基於過去霸權興衰史而來的結構主義式分析。根據這個命題，只要中國持續快速崛起，臺灣就無法逃避被併吞的命運。他在結論中提到：「只有一組環境條件，能夠使臺灣逃脫這個情境。特別是，所有的臺灣人都應該寄望，中國經濟成長在未來幾年會劇烈地慢下來，以及北京在國內遭遇嚴重的政治問題使得它必須把注意力放在內部。假如這些情況發生了，中國就無法站穩腳步追逐區域霸權，而美國就有能力，如現在的情況，保護臺灣免於中國侵略。本質上，臺灣能夠保持事實獨立的最佳途徑，就是中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顯得虛弱。不幸的，對臺灣來說，它毫無促成這個結果(中國變弱)的影響力。」米爾賽默於文章最後一句說：「總之，一個強大的中國對臺灣不止是個難題。它是個夢魘。」

<sup>2</sup> Benedict Anderson, "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ern Nationalism: Is there a difference that matters?" *New Left Review* 9, 2001 May-June, pp.31-42.

<sup>3</sup>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著，王超華譯，〈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五十五，二〇〇四，頁二一九。

<sup>4</sup> 這裡的引文，主要參照王超華的譯文(佩里·安德森，〈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頁三三四)。但為求精確，筆者有時根據原文作小部分的改譯(Anderson 2004: 8)。請讀者特別注意，我把separation譯為「隔離」，而非「分離」，是因為安德森在文章中同時使用了secession這個「分離」的詞，故在中文將兩者做出區分。

不管是不是「夢魘」，臺灣似乎避免不了被中國「政治整合」的命運。

兩位核心關懷與理論思路迥異的學者，在兩岸關係上，竟然得到一個近似的結論，讀來令人驚心。然而他們之間的差異，或許沒有表面上那麼大，至少從方法論角度，他們都從國際系統層次（systemic level）思考兩岸問題，安德森是地緣經濟決定論，而米爾賽默則是地緣政治決定論。他們都避談或忽略國內政治與公民社會層次的分析，也漠視小國自身可能具有的能動性（agency）。人類個體與群體的能動性，包括理念、價值、實踐、集體行動，都會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對結構性力量造成衝擊、構成挑戰。然而，根據他們兩人的預測，在對應中國對臺灣的影響上，臺灣似乎不能做什麼，也不必做什麼。但是，歷史真是如此發生的嗎？我們無法在短暫時間內提出證實或否證。但是，臺灣最近幾年發生的抵抗中國因素的運動，或許是駁斥他們兩人預測的最佳素材。而巧合的是，反服貿協議的占領運動，就爆發在〈跟台灣說再見〉發表於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的同一個月份。

## 二、經貿依賴結構

搭建經貿依賴的結構關係，是大國影響小國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中國政府也擅於對臺灣運用搭建經濟依賴關係。因而，中國因素在臺灣內部產生作用的前提是：臺灣在總體經

濟上依賴中國，使中國有施力的槓桿，以及個別企業集團對中國依賴並形成政商交換關係，回過頭來影響臺灣的政府政策與公共輿論。

臺灣在經濟上逐漸被吸納到所謂的「大中華經濟圈」，並日漸對中國經濟體產生依賴關係，是一個長期過程，從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即悄然進行。當時，中小企業出口型臺商開始前往中國東南沿海設廠，而產生第一波「大陸熱」。接著，資通訊產業（ICT）臺商從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開始登陸，這一波熱潮一直延續到二〇〇〇年代初期。李登輝總統主政後期（一九九八～二〇〇〇年）對中國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因此臺商赴中國投資仍有較多限制。陳水扁總統（二〇〇〇～二〇〇八年）雖然在政治關係上與中國處於緊張狀態，但在經濟上採取「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原則，大幅鬆綁臺商赴陸投資。在陳水扁總統任內，臺灣對中國的經貿依賴數據大幅度增長。

臺灣對中國（包含香港）出口額，在二〇〇〇年，占出口總額百分之二十四點四；二〇一〇年升高到百分之四十一點八；二〇一四年為百分之三十九點七。而中國（包含香港）對臺灣出口額，在二〇〇〇年，占出口總額百分之二點七；二〇一〇年為百分之二點五；二〇一三年為百分之二。在貿易依存度（即 trade-to-GDP ratio）方面，十幾年間，臺灣對中國（包含香港）貿易依存度也顯著爬升，從二〇〇〇年的百分之十三點八，持續增至二〇一一年的一年百分之三十四點九，二〇一四年稍降為百分之三十二點九。反觀中國（包含香港），

對臺灣的貿易依存度則一直很低，二〇〇〇年為百分之三點五，二〇〇四～〇五年達到百分之四點七的高峰，之後則下降到二〇一一年的百分之二點五。這組數據顯示，中臺兩方之相互貿易依賴結構極度不對稱。更有甚者，貿易依賴是直接投資帶動的結果。累計一九九一～二〇一三年，臺灣經濟部所核准的對外投資總額，其中高達百分之六十四點七集中於中國。

本文分析的貿易依賴乃坐落於國際間三角貿易結構（即臺灣、中國、以及美日歐）之中，因而此類依賴對臺灣的潛在影響尚有若干緩衝餘地。但隨著臺商深入中國，便愈依賴中國國內市場。我們觀察臺商企業集團在中國市場的營收比例，在二〇一二年，臺灣企業前三百大的營收總額中，百分之二十九點五來自中國，可見臺灣中大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之高。

二〇一二年臺灣總統大選前幾週，幾十家企業集團負責人公開支持「九二共識」。其中八家在中國的營收比例，都高過臺灣前三百大企業中國營收平均數（即百分之二十九點五）。這些企業負責人，有的在中國市場具有重大利益（例如頂新集團魏應充、潤泰集團尹衍樑、鴻海集團郭台銘、義聯集團林義守、裕隆集團嚴凱泰、長榮集團張榮發等），有的寄望開拓中國市場（例如威盛集團王雪紅、國泰金控蔡宏圖），他們在關鍵的政治時刻，以「在地協力者」角色在臺灣集體發聲，支持國共兩黨的政治議程，幫馬英九助選，展現中國因

素對臺灣的作用力。

一直到二〇〇八年陳水扁卸任前，臺灣與中國的雙邊互動，仍然以經濟為主軸，政治關係則處於潛伏的變化，間歇發生「以商逼政」的情節。除此之外，早在二〇〇五年，當時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代表團到北京與當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並發布「『胡連會』新聞公報」，<sup>5</sup>國共開啟合作關係，共同對付「臺獨」：

兩黨共同體認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謀求臺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sup>6</sup>

當時由民進黨執政，國共平台無法用「公權力」履行協議。二〇〇八年，馬英九擔任總統之後，國共合作立即進入「落實」階段，短時間內達成陸客來臺觀光、直航、《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等多項協定。二〇一三年六月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sup>5</sup> 這個「公報」的全名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會談新聞公報」，簡稱「胡錦濤與連戰會談新聞公報」以新聞稿方式發布。

<sup>6</sup> 見「胡錦濤與連戰會談新聞公報」，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即是 E C F A 的後續談判項目。在「服貿」之前，兩岸已經簽署十八項協議並已執行，「貨物貿易協議」也在談判中。如果兩岸在 E C F A 架構下施行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協議，則相當於形成一個自由貿易區。在同一期間，兩岸不但在磋商「互設辦事處」，而且，北京已經提及兩岸協商「政治協議」。換言之，在馬英九總統任內，臺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快速地建制化，並且將兩岸協商從經濟議題擴及政治議題。

經貿依賴關係在政治上發酵，這是北京預期的目標。在這同時，北京也積極運用兩岸政商網絡來執行「收買臺灣」的政策，進行所謂「以商圍政」策略，並對臺灣政府施壓。<sup>7</sup>然而，就在北京逐步收割臺灣對中國經濟依賴的政治果實的時刻，臺灣社會的警覺度也日漸提升，並在服貿議題上促發了大規模的集體抵抗行動。

### 三、從「反服貿」到「占領行動」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晚間，學生與民眾赤手空拳，衝破立法院大門，在議場靜坐，抗議國民黨立委前一天強行「通過」服貿協議；幾個小時內，立法院四周馬路上擠滿了自發前來的民眾，「保護」議場內的學生，從此開始了占領運動。這場占領行動，隨後被媒體稱為「太陽花學運」。從表面互動觀察，占領行動是對國民黨立委違反民主程序的反抗。然而，

從深度剖析，太陽花占領行動是一場構造複雜的社會運動，是累積數年的民怨總爆發：對馬政府施政的不滿，以及對中國因素影響生計、侵蝕臺灣民主的憂慮，已經醞釀很長一段時間；民心正在發生改變，如此激昂的占領行動，才能得到多數民意的支持。從運動的動員過程看，反服貿運動早在二〇一三年夏天即已開始，並且集結不少公民組織。若將時序拉得更長，與中國因素有關的抗爭行動，早在二〇〇八年已經啟動。

以下時間序列，圍繞著「中國因素」，回顧占領運動發生的前後脈絡，以趨近占領運動的歷史動態。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率團訪臺，民進黨與民眾示威抗議，馬政府過度的維安措施導致民眾不滿並引發衝突，警察大規模鎮壓抗爭的民眾。十一月六日，學生於行政院前靜坐抗議，被清場後轉至自由廣場，開始「野草莓學運」，持續至翌年一月四日。

7 「收買臺灣」的方式繁多，例如媒體業的「旺中收購案」、頂新集團的「鮭魚返鄉」掌控臺北二〇一〇的經營權、農漁業的「虱目魚製作」、陸客觀光團與自由行的「一條龍經營」等等。參見吳介民，〈政治ゲームとしてのビジネス——台灣企業の政治的役割をめぐって〉（做為政治賽局的商業活動：臺商的政治角色），收錄於園田茂人、蕭新煌編，《チャイナ・リスクといかに向きあうか：日韓台の企業の挑戦》（如何面對中國風險：臺日韓企業的挑戰），二〇一六，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二〇〇九年九月，高雄電影節規畫播放新疆維吾爾族海外運動領導人熱比婭（Rohiya Ka-car）的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引起中國政府抗議，以不讓陸客團進入高雄觀光做為脅迫手段。臺灣內部則有立法委員與旅館公會施壓高雄市政府。事件發生過程，可以觀察到中國因素之「在地協力者」的運作痕跡，包括泛藍立委、臺商組織、旅遊業者利益團體，都對高雄市政府施壓撤片。而民進黨與公民組織則採取抗爭行動，支持高雄市政府抗拒中方與臺灣政商團體。高雄市政府承受壓力，讓《愛》片如期播放，但代價是策展的高雄市「新聞處」被市議會裁撤，到二〇一〇年底，高雄市與高雄縣合併後才恢復改為「新聞局」編制。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兩岸代表在重慶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六月三十日，公民團體「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兩督盟）成立。兩督盟為最早專門監督兩岸協商的單一議題組織，持續在公共領域發聲，並提供兩岸協商的相關資訊。

二〇一二年六月，臺灣一位法輪功成員鍾鼎邦返回江西老家探親，被以「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罪名逮捕，臺灣許多公民團體參與了長達兩個月的海內外營救；鍾鼎邦於八月獲釋返台。

二〇一二年七月到十二月，「反媒體壟斷運動」登場，起因於「旺旺中時集團」試圖併購系統廠商的「壟斷行為」、旺中媒體干涉新聞言論自由、以及旺中負責人蔡衍明個人的親中言論。在此運動中，青年學生團體為重要的參與者；抵抗「中國因素」的論述在此運動過程中被明確提出。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兩岸代表在上海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當日，「兩督盟」與各社運團體開始舉辦抗議活動。六月二十五日，立法院朝野協商達成結論，包括：「服貿協議本文應經立法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六月二十六日，多位出版、文化界人士聯署反對服貿黑箱作業。七月二十八日，社運團體結盟組成「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簡稱「民主陣線」）。七月三十一日，各校學運社團組成「黑色島國青年陣線」（黑島青），要求退回服貿協議。

二〇一四年三月中旬，「民主陣線」得悉馬政府可能於近日以行政命令宣告「服貿協議」生效，因此規畫「捍衛民主一百二十小時行動」，並號召於三月十七日在立法院舉行抗議行

8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是由三十多個臺灣公民團體組成的社團聯盟，成員長期致力於台灣的民主、人權、勞工、農民、環保、婦女、社福、教改與青年運動。聯盟成員包括：「兩岸協議」監督聯盟、臺灣守護民主平台、澄社、台灣教授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勞工陣線、台灣農村陣線、婦女新知基金會、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一九八五公民覺醒聯盟、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大高雄總工會、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民間監督健保聯盟、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勵馨基金會、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臺南市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親子共學促進會、人本教育基金會、憲政公民團、永社、北社、看守台灣協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

動。三月十七日，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強行宣布「服貿協議」通過審查。

三月十八日，晚間九點十分左右，一群學生與公民團體衝入立法院，占領議場。警方嘗試清場失敗。當晚大量市民集結於立法院周邊「保護」占領議場的學生。許多社運與NGO團體在立法院周圍進行演講等活動。三月十九日晚間，學生舉行記者會，提出「退回服貿」的訴求。三月二十一日，臺灣守護民主平台、民主陣線等公民團體，公布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要求先立法，再審查兩岸協議。三月二十二日下午，行政院長江宜樺到立法院與學生及公民團體對話，未達成共識。

三月二十三日，上午，馬英九總統舉行記者會表示：學生違法占據立法院；退回服貿破壞法治；服貿協議若未通過，將影響台灣進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機會；服貿協議對國家安全、中小企業沒有危害；同意逐條審查、逐條表決。「占領運動決策小組」確定了「先立法再審查」的抗爭訴求。當日晚間七點三十分左右，數百名學生、社運團體成員、以及一般公民衝入行政院，隨後更多群眾加入。警方從深夜開始清場，強力驅散、逮捕，並造成許多參與者受傷，驅散鎮壓行動持續到翌日清晨。警察毆打民眾的照片與影片在社群媒體廣泛流傳，引起公眾憤怒。

三月二十四日，立法院八個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決議：(一)張慶忠三月十七日召開的審查會無效；(二)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制定後才可審服貿；(三)要求行政院撤回服貿協議，

並重啟談判。<sup>9</sup>同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有關兩岸服貿協議議題，由臺灣自行決定。

三月二十六日，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表示：臺灣發生反服貿抗爭，「需要從臺灣內部找原因」。

三月二十九日，馬英九總統舉行記者會，提出服貿協議「逐條討論與表決」，但仍反對「退回服貿」。

三月三十日，估計有五十萬人集結於總統府前，此次集會要求「退回服貿協議」，「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監督機制立法時應納入民間版；並召集「公民憲政會議」。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馬英九總統記者會，提出：(一)不退回服貿；(二)服貿協議逐條審議、逐條表決；(三)官方版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立法，將在數日內由行政院通過草案。

四月三日，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素在參議院作證說：「強化我們與臺灣的關係以及我們與臺灣人民的長期友誼，仍然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再平衡的一個關鍵要素。」

四月六日，立法院長王金平發表聲明，支持《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並承諾在完成立法前不會召集與服貿協議相關的黨團協商會議。

四月七日，占領行動的決策小組發表聲明，表示將於十日退場。四月十日傍晚，學生

9 這個會議，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全數缺席。

退出立法院議場。

從以上的事件發展序列，可以觀察到事件的關聯性、集體行動經驗的傳遞、以及抗爭組織的連續性。二〇一三年七月底成立的「民主陣線」，是反服貿運動的一個樞紐組織，它的組成社運團體包括「兩督盟」、「臺灣守護民主平台」（成立於二〇〇九年一月，為參與野草莓運動之大學教師與社運成員所組成）、「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等數十個組織。「民主陣線」在正式成立前，於二〇一三年六月到七月之間的活動，是以「兩督盟」與各社團結盟的方式舉辦活動。「民主陣線」於二〇一四年十月改組為「經濟民主連合」。依此而論，「太陽花學運」的成員不止學運分子，還包括為數眾多的NGO、社運成員，以及積極公民，因此稱為「太陽花運動」更為適切（更多關於參與主體的討論，詳後）。

占領行動爆發前，臺灣社會與政界，對服貿議題已經有不少爭論。雖然，立法院在大眾怒聲中，於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合計辦了四場服貿公聽會，但並不足以平息社會不滿。馬政府在社會壓力、以及民進黨的反對下，透過朝野協商，同意在立法院審查前，再辦十六場公聽會，由國民黨與民進黨立委各召集八場。結果國民黨召集的前八場，集中安排在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到十月七日之間，只有短短一週；民進黨召集的後八場，則安排在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到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持續四個多月，採取拖延戰術。而國民黨就在兩黨公聽會舉辦完後，以立法院委員會內的多數優勢，強行宣布審查通過。根

據二〇一三年六月的朝野協商，服貿協議須經過「實質審查」，因此，張慶忠三十秒闖關行為，被視為撕毀朝野協商，故而引爆占領行動，成為太陽花運動的「導火線」。

除了「導火線」，還有長期積累的「遠因」。如上所述，從二〇〇八年開始，「中國因素」對臺灣政經社會的影響，引起人們的疑慮與抵抗。從反服貿運動，一路演變成太陽花占領行動，是對馬政府執政期間之經濟不振、反民主與違法濫權行為、以及國共兩黨壟斷兩岸關係的「總爆發」。許多民眾對馬政府的不滿（其民意支持率曾一度低到百分之九點二），包括掠奪性的威權開發主義行為：壓抑勞工權益、剝奪農民土地、違法都更、污染環境與破壞生態事件層出不窮。臺灣勞工的實質薪資在二〇〇三年的高峰之後即下滑，馬英九在二〇〇八年競選時曾提出一系列改善經濟的承諾，但全部未能實現；在他任內，薪資持續倒退，回到一九九八年的水平。政府機構的腐化，也可從軍隊紀律敗壞中觀察到：二〇一三年七月，義務役士官洪仲丘退伍前在軍營中被虐待致死，國防部處置不當，導致二十五萬人在凱達格蘭大道示威。再者，臺灣數十年來營造的基本民主架構，在馬政府手中逐步倒退，包括新聞自由度降低、檢察總長違法利用檢調權力介入政爭；以及不顧民意強行修改歷史教科書課綱，使之更符合「中國史觀」。而馬政府所執行的兩岸政策，主要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國共合作平台排除了反對黨與公民社會的參與。馬政府的諸多作為，宛如「威權復辟」，甚至讓一些法律學者認為，馬總統的作為已經引發「憲政危機」。

根據作者的實地觀察與多年來參與觀察，太陽花參與者在抗爭現場所提出的議題包括：

第一、民主正當性問題。服貿協議被視為國共兩黨之間黑箱談判的產物，缺乏程序合法性，也缺乏民主正當性，簽署之前資訊不透明，也未經立法院監督，簽署之後尚未經過實質審查即宣告通過。

第二、弱勢產業與弱勢群體保護問題。服貿協議臺方開放的產業類別非常多，其中許多涉及弱勢與敏感產業。一旦協議生效，這些產業可能面臨生存危機，從業者也可能暴露在失業的風險中。在服貿協議談判過程，馬政府並未認真調查、充分諮詢這些產業的實況與意向，沒有具體的影響評估報告，也沒有事後救濟的措施配套。此外，服貿協議執行後，也可能帶來中國的「商業移民」與「勞動移民」，尤其是勞動移民的問題，引發了對國內就業權排擠的疑慮。

第三、對「中國因素」侵蝕臺灣民主與主權的擔憂。服貿協議中，許多開放的項目涵蓋狹義與廣義的國家安全議題，例如銀行資訊、數位資訊、通訊產業、基礎建設等等；而印刷業的開放則涉及言論出版自由。馬政府的國策顧問郝明義，在服貿協議簽署前夕，緊急呼籲馬政府注意服貿協議可能侵蝕臺灣的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他在呼籲沒有被接受後，辭去國策顧問職位。服貿協議嚴重而可見的後果是：將臺灣的經濟進一步「鎖進」中國經濟體，進入更深更廣的依賴結構，使得北京可以深入操縱臺灣政治。因此，在太陽花抗議現場，

可以看見「服貿協議＝賣臺＝投降協議」這樣的標語。

第四、對「自由貿易」霸權的挑戰。E C F A 體制下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其經濟性質指向兩岸之間的貿易自由化。在 E C F A 架構下，如果服貿協議與當時也在談判中的貨貿協議都執行的話，兩岸間將成為一個「自由貿易區」(F T A)。對兩岸之間成為自由貿易區的批判，來自兩方向：一是對不斷加深的臺灣對中國經貿依賴的擔憂；另一是對自由貿易本身的質疑。這兩個批判既相互關聯，又可以分開看待。觀察占領的論述，擔憂經貿依賴深化的聲音，可能高過對自由貿易原則的反對。但儘管如此，反自由貿易或質疑自由貿易，確實是抗爭現場一股力量。

綜合以上分析，對於「中國因素」的警戒與抵抗，至少可以追溯到二〇〇八年陳雲林訪臺造成的衝突事件，因此，不論從時間深度而論，或從議題的關聯性，「中國因素」是醞釀太陽花運動之深層因素。但我們也須留意，並非所有太陽花運動參與者，都因「反中國因素」而被動員；不過，如果抽離了「中國因素」在這波集體行動中的動員作用，將難以理解這場運動的能量，以及對臺灣社會的意義。

#### 四、占領行動的主體與創意

前節闡述太陽花運動發生的因素，以及反服貿運動的歷史脈絡。這場占領，不但震撼臺灣政局，創造一種新形態的抗爭政治，也讓臺灣的抗爭聲音傳播到世界，並讓美中兩國都做出回應。這節將說明運動參與的主體、過程及其效應。

##### （一）學運力量、青年世代、公民社運組織的匯聚

太陽花運動的參與主體是誰？很明顯的，學生與青年的角色至關緊要。三月十八日衝進立法院的主力是學生與青年。因此，不少人把這個運動稱為「太陽花學運」。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這場運動中，公民組織與社運團體所扮演的角色。把時間的視野拉長，學生、公民社運組織、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先行世代，<sup>10</sup>都是這波運動的參與主體。

回答「太陽花運動的參與主體是誰？」這個問題，同時涉及這場集體行動的空間性質。由於在立法院議場內的占領者（以學生為多數），被警察包圍；抗爭者要進出議場內外時，必須通過警察的封鎖圈，也必須通過占領者的糾察線。因此，抗爭空間便呈現三層結構：最內圈（第一層）是占領者、中間是警察、外圍是支援的抗爭者。議場內外的抗爭者之間的溝通協調型態，便呈現多元行動中心。當然，議場內外的抗爭者每天進行「聯席會議」，但

是許多行動決策並非通過這個聯席會議做出決定。議場內有比較具有向心性的核心「決策小組」（九人小組），但議場二樓仍然存在一群守衛者的「奴工」，有獨特的自我認同。<sup>11</sup>而在立法院四周所形成的對議場占領者的「保護層」（第三層），參與者的成分與背景則高度多元而複雜：有來自各種公民社運團體，其成員不乏各類社運幹部、人權組織、環保組織、工運組織、媒體改革組織等等，以及教師與積極公民。這些人當中，許多在過去幾十年民主化運動過程都曾是積極分子，例如傳統臺獨運動世代、一九八〇年代的「野百合運動世代」、一九九〇年代「社運黃金年代」的幹部、二〇〇〇年代的「反樂生療養院迫遷運動」的參與者，以及二〇〇八年的「野草莓運動世代」；加上許多難以使用「既定語彙」給予稱謂的參與者，比如自發在立法院周邊擔任糾察工作、但在組織上不屬於「糾察隊」的計程車司機與「兄弟們」，以及許許多多「沒有臉孔的人」<sup>12</sup>。

<sup>10</sup> 例如在學生與青年們進入議場過程，長期在立法院濟南路邊駐紮的「公投盟」也加入在立法院正門推擠，讓警方一段時間分不清衝撞主線，達到聲東擊西效果。

<sup>11</sup> 關於占領空間的特質，可參見江昺崙，〈空間、掙扎與權力展演〉；二樓奴工，參見梁秋虹，〈肖像。沒有臉孔的人〉；兩篇皆收錄於晏山農等，〈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二八運動全記錄〉，臺北：允晨文化，二〇一五。

<sup>12</sup> 梁秋虹，〈肖像。沒有臉孔的人〉，收錄於晏山農等，〈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二八運動全記錄〉，臺北：允晨文化，二〇一五，頁二六七—三二五。

這些NGO組織幹部與參與者，在立法院四周舉辦了各式各樣活動，並且展開各種組訓培力，如「非暴力抗爭訓練」、「公民審服貿」(D-Free)與「人民議會」(嘗試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的溝通模式，轉到街頭活動上)、「開放論壇」(讓圍觀者成為發言主角)、「街頭公民教室」等等。此外，還有「賤民解放區」、「大腸花」等與運動主流旨趣不同的論壇。多元而異質的抗爭模式不斷翻出，是太陽花運動可以延續二十四天而不致「冷場」的關鍵因素。<sup>13</sup>從另一個角度，占領行動適時接隸了公民社會與社運場域的各種聲音，將之轉化為自發的社會行動。其中，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如臉書扮演多大程度的動員？一項在運動現場針對參與者的大規模訪談，反駁了多數參與者是被「網路動員」說法；相反地，他們傾向自身的參與是「自發性」的行動。<sup>14</sup>

## (二) 自發與創意

除了自發參與，這場運動的有序分工，也值得注目。當時，只要到立法院內外走一趟，即可發現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數以千計的參與者，聚集在臺北市內一個街區，日夜在一起工作、生活、進行抗爭，如何不產生嚴重的公共安全、衛生或其他問題？

學生與公民團體提供了各種後勤援助，使這個「無政府」的有序空間得以成立，包括飲食(飲水、便當、點心、「戰地廚房」、臨時廁所與淋浴設施、舞台音響設備、帳篷、睡袋、

垃圾分類、網路設施、醫療團隊、法律顧問、甚至心理諮商服務。<sup>15</sup>而在運動本體的組織分工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數以百計的學生與青年投入這些工作：現場主持與指揮、媒體聯絡、多國語言翻譯、文稿撰寫、糾察與安全、決策團隊、聯席會議等等，組合成一個「臨時擬政府」。此外，社群媒體和虛擬空間也提供抗爭活動的載體，許多網路社群更即時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與訊息。當然，在這樣的抗議運動場合，還有無數充滿創意的海報、塗鴉、與藝術作品。至於無序或有序，只是相對概念。議場內以及議場內外之間的溝通不良、信任等問題確實存在，各種人際與團體間的矛盾也經常可見。其中，原運分子離開在青島東路和濟南路的「主場」，轉到捷運善導寺站三號出口附近的一個公園另闢戰地聚講(參見本書 Nakao Eki Pacidal 的文章)。但總體而言，這場運動仍然展現出高度的自治能力。可以這麼

13 根據作者的參與觀察，光是十多場「公民審服貿」活動，就含納了數以百計的主持人、簡報講者、協調者與後勤工作者，並吸引了數千名積極公民的參與。活動主辦團體並且將公民審議的內容整理上網：<https://www.facebook.com/twdstreet>。

14 陳婉琪、黃樹仁，〈立法院外的春吶：太陽花運動靜坐者之人口及參與圖像〉，《台灣社會學》三十：二〇一五，頁一四一～一七九。

15 關於抗爭現場的資源籌措與配置，另參見田島真弓，〈太陽花學運的物質資源籌措機制：社交媒體與社會資本〉，《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廿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三十日。臺北：中央研究院。

說，自發與自治是這場運動最成功的標誌之一。「無政府空間」與「臨時擬政府」並立，構成有趣的對比與張力，值得未來更深入探究。

充滿義憤、活力、與創意的青年學生，是運動的主力。青年世代對中國與兩岸關係的一般態度，以及對自由貿易的不滿態度正在醞釀中。二十年來，臺灣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已經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擴大、青年失業率上升、勞動貧窮人口增多等等。青年世代被稱為「崩世代」<sup>16</sup>或「22 K 世代」（每月賺取兩萬兩千元臺幣的薪資）。太陽花運動的年輕參與者除了大學生與高中生，還有不少剛進職場的青年，其中女性也占了大半。青年學生強烈感到「被偷走的未來」，或者前途茫茫，終於在這場運動中，找到抒發不滿的門路。在示威中，一條橫幅寫著：「拒絕去中國當台勞，待業青年接力反服貿」。而塗寫在立法院大樓外牆上的「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更直接傳達青年的憤怒。「太陽花論壇」則提供另類的發言空間，參與者透過粗口開罵，顛覆統治秩序（演說者必須以「幹××」做為發語詞），直接對「國民黨」、「馬英九」和「中國」罵幹。尤其令人讚歎的是，參與太陽花的演說者不乏充滿創意而憤怒的女性聲音。在大腸花論壇裡，百無禁忌的「罵幹論述」(curse discourse)，也是一種「論述狂歡」(discursive Mardi Gras)的縮影，它呈現臺灣青年世代的認同變遷，相對前一輩人，年輕人更能自在地表現認同。

就本文關心的軸線——臺灣公民社會如何抵抗中國因素——青年世代的「論述狂歡」

所揭示的臺灣認同強度是驚人的。他們無畏於說出、也不吝於說出「我支持臺灣」。在這樣的言說互動中，解構「臺灣的污名」，也抵抗中國政府對臺灣獨立支持者的恫嚇。換言之，這場運動是「價值宣誓，宣誓『我們沒有被說服，被中國的大國價值所說服』」。<sup>17</sup>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原先「統戰策略」設想的是，培育一群親北京的財團與政客、收買媒體引導輿論，便可以「解決」臺灣人的認同問題。但是這個「認識框架」已經被太陽花運動無處不在的「論述狂歡」所顛覆。對年輕世代而言，臺灣人認同屬於集體靈魂的尋索過程，是在日常生活的細微互動中點滴累積起來，其紮實、頑抗性遠高於「中國中心主義者」所能想像。

換言之，北京「收買臺灣」的策略，現在反而變成一個難題。而北京似乎也很快在調適這個新現象，試圖做出回應，聲稱將「聽取臺灣年輕人的意見」。<sup>18</sup>

16 林宗弘等，《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台灣勞工陣線協會，二〇一一。

17 林峯燦、吳鴻昌、湯志傑，〈後冷戰格局下的太陽花運動：談太陽花運動的歷史性與世界性〉，「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廿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三十日，臺北：中央研究院。

18 「兩岸新政策-孫亞夫：聽臺灣青年意見」，《聯合新聞網》，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http://0rz.tw/V3tue>（擷取日期：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 五、誰支持太陽花運動？

前兩節描述太陽花運動積極參與者的理由、主體、過程及其效應。那麼，在社會層面，哪些人支持太陽花運動？支持或反對的變數是什麼？根據中國效應研究小組(CIS)在二〇一五年進行的問卷調查，我們使用二元邏輯回歸(將贊成太陽花運動歸碼1，不贊成0)，檢證幾組變項後發現，民眾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主要的顯著變數包括：政黨因素、中國因素、對民主與政府的評價、世代/年齡、教育、統獨選擇、以及婚姻狀態。<sup>19</sup>

在政黨因素方面，不同的政黨認同讓民眾表現出支持態度的差異：偏綠的政黨認同傾向支持太陽花，而偏藍的政黨認同則傾向不支持。認為國民黨政府太過「傾中」的人，<sup>20</sup>強烈支持太陽花運動，這個變項的影響力是所有變項中最高的；在分析樣本中，有百分之六十四的受訪者認為國民黨政府太傾中。此外，比較信任民進黨政府與中國進行談判的，也明顯支持太陽花運動；在分析樣本中，信任民進黨政府進行談判的人有百分之四十六，而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九。同一個問題，在二〇一三年調查時，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任高於民進黨，當時信任國民黨政府代表談判的有百分之四十九，信任民進黨為百分之三十四。<sup>21</sup>很明顯，民眾的態度在二〇一四年太陽花運動之後，發生了翻轉。

中國因素方面，在目前兩岸關係下擔心失業率者傾向支持太陽花。關於兩岸交流協商中，

認為國家主權比經濟利益重要的人傾向支持太陽花。此外，認為中國未來可能民主化的人，也傾向支持太陽花。但認為中國將持續快速經濟成長的人傾向反對太陽花。這組結果呈現，民眾對中國因素的考量乃是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評估，並且在總體層面衡量經濟利益與國家主權孰輕孰重。顯示民眾的態度並非情緒性的所謂「逢中必反」，而是理性計算，尤其民眾的考慮中，還包括對中國民主化可能性的評估。

在統獨方面，傾向獨立的民眾，相對於中間態度者，比較支持太陽花運動，而偏向統一的民眾則不支持。<sup>22</sup>但就實質影響力而言，統獨因素的重要性低於政黨因素、中國因素、與世代因素。綜合中國因素與統獨選擇，我們發現臺灣的國家認同議題存在一個浮現中的「生計概念」，與我們之前一篇論文針對二〇一二年總統選舉投票行為的分析一致<sup>23</sup>，亦即，

19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CIS)二〇一五年電話問卷調查，於當年一月執行調查，完成樣本數一、二七七人，本研究合格分析樣本為一、〇二六人。

20 即詢問「國民黨是否太過傾向中國大陸政府的立場？」

21 「中國效應研究小組(CIS)二〇一三年電話問卷調查，於二〇一三年四月、五月執行調查，完成樣本數一、二四三人。

22 本研究對受訪者統獨選擇的判定，係採取吳乃德〈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愛情與麵包：初探臺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參見文末參考書目)的「有條件兩題式問法」。下同，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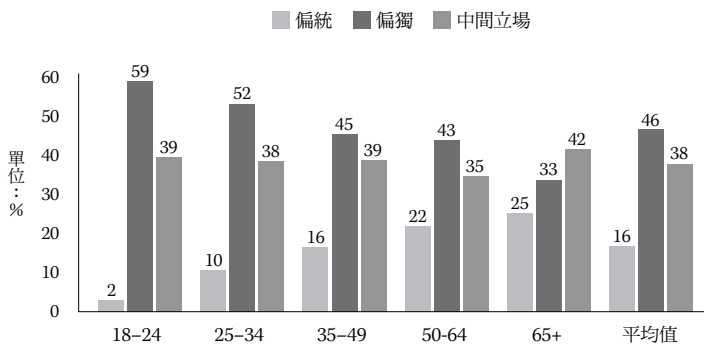
23 吳介民、廖美，〈從統獨到中國因素：政治認同變動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台灣社會學》二十九，二〇一五，頁八十一—一三二。

當考慮了中國因素，原先統獨選擇對行為或態度的影響降低了，臺灣國家認同的內涵，可能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遷。

教育因素的分析顯示，相對於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高中職與專科學校的畢業生呈顯反對太陽花；但是大學以上教育者（一樣相對於國中以下教育背景）則不顯著。婚姻狀態方面，已婚狀態者比較反對太陽花。

民主評價與政府評價方面，認為民主制度好於獨裁制度的人傾向支持太陽花。對政府評價（即評判當政的馬政府）好的人則反對太陽花。

世代／年齡方面，年輕人顯著支持太陽花。十八到二十四歲對比於三十五到四十九歲，支持太陽花的機率是二點七倍；二十五到三十四歲年齡層，相比於三十五到四十九歲年齡層，則是一點六倍；反觀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則傾向反對太



圖一——不同年齡層的統獨選擇

資料來源：中研院CIS2015問卷調查。分析樣本數，1026人。

陽花運動。這個發現證實了年輕世代對臺灣政治事務的關心程度正在提高，而且也跟晚近「年輕世代臺獨化」的命題吻合。觀察民眾的統獨選擇：不分年齡，選擇統一有百分之十六，選擇獨立有百分之四十六，中間立場為百分之三十八。分不同年齡層觀察，特別在十八到二十四歲年齡層，只有百分之二選擇統一，他們有高達百分之五十九選擇獨立，另有百分之三十九選擇中間立場。要言之，愈年輕，選擇獨立的比例愈高（圖一）。

總體而言，對太陽花運動的支持與否，政黨因素的實質作用力最大，中國因素次之，再來依序為世代／年齡、對民主與政府的評價、教育程度、統獨選擇、婚姻狀態。這裡需要注意的，在分析歸類為政黨因素的變項，其實也包含一定程度的中國因素成分，例如國民黨政府是否過度傾中、兩岸談判比較信任哪個政黨等題目，就涵蓋了臺灣與中國關係的評估；換言之，這幾個變項測量已「被中國因素化」的政黨因素。

最後，我們需要討論那些在直觀上重要、但在統計上不顯著的變項。首先，階級變項全部不顯著，省籍、所得也都不顯著。至於，本文關切的「人們對於自由貿易的態度」呢？統計結果顯示，受訪者中有百分之七十三贊成與中國擴大自由貿易，反對者有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九十贊成與美國擴大自由貿易，反對者只有百分之十。臺灣的一般民意幾乎一面倒支持自由貿易。但是，不論是「跟中國大陸擴大自由貿易」或是「跟美國擴大自由貿易」，贊成或反對的立場，都與支持太陽花與否在統計上沒有顯著關聯。

以上發現，指出兩個特點：第一，太陽花支持者與太陽花運動幹部／積極參與者之間，存在著關注議題的差異。太陽花運動積極參與者中，有一部分人反對服務貿易的理由是反對自由貿易，這個現象可以由抗爭現場的海報布條與論述獲得證實，儘管我們無法確定其比例程度。<sup>24</sup>但是，一般民眾支持或反對太陽花與他們對自由貿易的態度無關。第二，晚近青年政治運動蓬勃發展，被認為是左翼民族主義正在興起，或者民族主義社會的基礎向左移動。<sup>25</sup>但是，在一般民眾層次，調查資料顯示階級因素並不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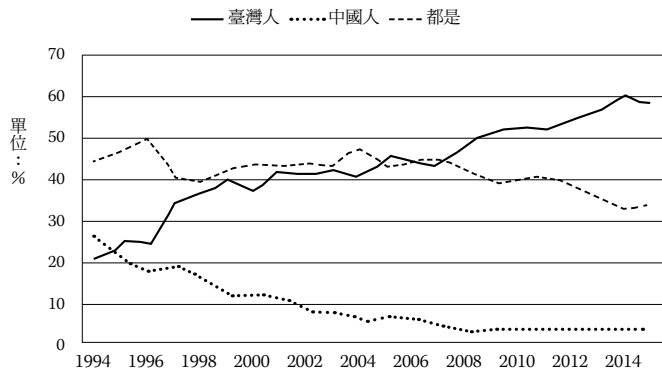
## 六、「被統一」的焦慮與張力

太陽花運動的爆發，民眾對此集體行動的

支持與否的態度，以及此行動對民意的影響，都與臺灣人民的政治認同息息相關。而且，近年來，民意對中國相關因素的態度，顯示出民眾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在升高。在臺灣政治深層，一個主要的伏流是「被統一」，或是臺灣被中國兼并的焦慮。我們先從國族認同的變化趨勢談起。

### 臺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TEDS）長達二十餘年的調查，從一九九四年以來，臺灣人認同一直呈現穩定增加的趨勢（圖二）。臺灣人認同在一九九四年占百分之二十，低於中國人認同的百分之二十六。但是到了二〇一五年，臺灣人認同已高達百分之五十九，而中國人認同則只有百分之三點三。雙重認同（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在一九九四年是百分



圖二——臺灣民眾國族身分認同的變遷趨勢，1994-2015年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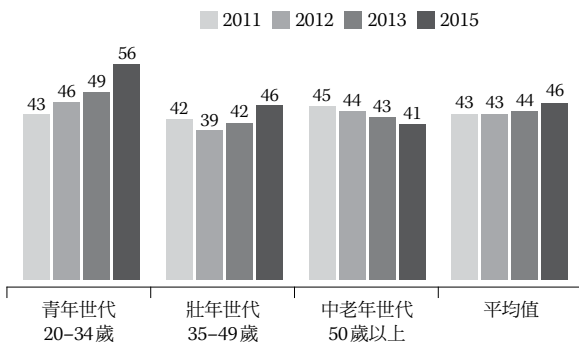
24 曾柏文，〈太陽花運動的論述軸線〉，Szu-chien Hsu, "The China Factor and Taiwan's CSOs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The Case of Democratic Front against the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DFACSSSTA)"，兩文皆收錄於「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廿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三十日，臺北：中央研究院。

25 吳叡人，〈黑潮論〉，「重構台灣：太陽花的振幅與縱深」研討會，台灣教授協會主辦。臺北。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四、十五日。

之四十五，到二〇一三年則為百分之三十四，呈緩慢降低。從圖中，可觀察到臺灣人認同與其他兩種認同的交叉。第一，在一九九五年，臺灣人認同超過中國人認同，此後持續拉開差距。第二，臺灣人認同在二〇〇八年超過雙重認同，此後也拉開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二〇〇一（二〇〇七年之間，大約是陳水扁執政階段，臺灣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處於拔河狀態；臺灣人認同在馬英九執政階段大幅度領先。因此，可以得到一個暫時結論：在馬政府執政期間，其拉近與中國關係的大陸政策，加上中國因素開始在臺灣發生作用，在民意態度上，反而伴隨更為高漲的臺灣人認同。

### 年輕人臺獨支持率上升

年輕世代對臺獨的支持度，近年來也呈現



圖三——年輕人臺獨支持率持續上升，2011-2015年  
數字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分析人數自2011年依序為1144人，1035人，1128人和1044人。資料來源：中研院社會所CIS系列問卷調查。

增加趨勢(圖三)。二〇一二年，青年世代(二十到三十四歲)中支持臺獨者有百分之四十三，與平均值相當；壯年世代(三十五到四十九歲)為百分之四十二；中老年人(五十歲以上)則是高於平均值的百分之四十五。到了二〇一二年，情況有點改變，青年世代臺獨支持率升高到百分之四十六，高於平均值；對比之下，壯年世代是低於平均值的百分之三十九，比前一年低百分之三；而中老年人則是百分之四十四，也比前一年低，但仍高於平均值。二〇一三年，青年世代的臺獨支持率增為百分之四十九；壯年世代為百分之四十二，比前一年稍高；中老年人則降至百分之四十三，低於平均值。二〇一五年，經過太陽花運動與九合一選舉，青年世代的臺獨支持率大幅上升，增至百分之五十六，比平均值高了百分之十；壯年世代也提升為百分之四十六；但中老年人則持續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一。

從這四年間的調查數字，可清晰看到幾個變化。第一，臺獨支持率總體而言有升高態勢，但速度相對緩慢。第二，壯年世代的百分比與總體分布很接近。第三，中老年人則呈相反方向變化，對臺獨的支持率連年降低。第四，青年世代對臺獨的支持度，逐年上升，以二〇一三到二〇一五年的攀升最為顯著。支持臺獨不再以中老年人為主力，而是年輕人的新潮現象。

### 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

接著，觀察臺灣民眾對中國政府影響新聞媒體的評估。圖四呈現 C I S 二〇一三年的調查，全體受訪者有百分之七十一同意「中國大陸政府對臺灣媒體的政治立場影響越來越大」。其中，在十九到二十四歲和二十五到三十四歲兩個年齡層，都有百分之七十九同意這個看法，高於中、老年齡層。整體而言，同意的比例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遞增；不同意則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遞減。<sup>2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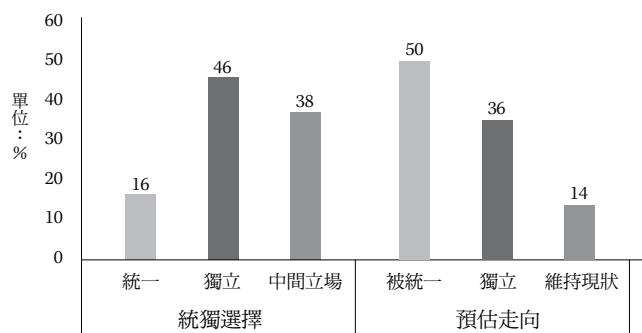
### 被統一的焦慮感

統獨爭議連綿數個世代，攸關國家前途的預期落差，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結果。以往對於統獨態度的調查研究，只針對受訪者當下的選擇

做調查，並不觀察受訪者對時間向度的敏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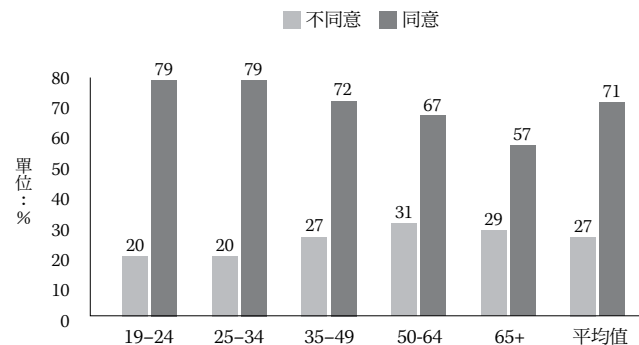
C I S 二〇一五年的問卷調查，增加了一個題目：「請問您覺得未來兩岸關係最有可能出現什麼結果？」答案選項包括：「臺灣被中國大陸統一」、「臺灣獨立」、「維持現狀」（圖五）。我們把這一題的測量結果，與當下統獨選擇做對照，發現在「當下統獨選擇」與「預期未來兩岸關係」之間，存在著明顯落差。在當下統獨選擇的維度，多年來，「統一」支持者逐漸萎縮，二〇一五年調查只有百分之十六受訪者選擇統一；但是，當詢問人們對未來趨勢的評估，卻有高達百分之五十四。「獨立」已成為當下選擇的主要選項，有百

26 C I S 二〇一五年沒有訪問這個問題，此處以二〇一三年的調查為依據。



圖五——統獨選擇與預估走向的差距

資料來源：中研院 CIS2015 問卷調查。樣本數 1026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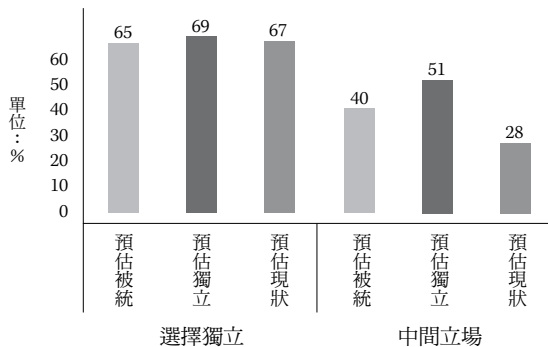
圖四——中國政府對臺灣媒體的政治立場影響愈來愈大

資料來源：中研院 CIS2013 問卷調查。樣本數，1216 人。

分之四十六；但評估將來可能獨立者則為百分之三十六，落差達到百分之十。當下選擇「中間立場」的人有百分之三十八；然而，預估臺灣未來可以繼續「維持現狀」的人，只有百分之十四，落差為百分之二十四。這樣的預期落差，一方面可能造成社會焦慮，一方面也可能產生政治張力。

### 統獨與太陽花支持率

我們進一步探究，關於統獨的預期落差，會不會表現在對太陽花運動支持率的差異？當下統獨選擇與預估兩岸未來這兩個變項，各有三個選項，可以構成「九種」態度，由於以選擇統一與三種未來走向預估交叉分析後，次樣本太小，在此省略這部分的分析。最後，我們將「六種」態度與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進一步交叉分析，發現：（一）凡是當下選擇獨立者，不論預估未來是



圖六——六種統獨組合立場者的太陽花支持率

資料來源：中研院 CIS2015 問卷調查。樣本數，1026 人。

何種結果，對太陽花的支持率都超過平均支持率的百分之五十：預估被統一者為百分之六十五，預估獨立者為百分之六十九，預估維持現狀者為百分之六十七，三者間差異不大。（二）當下選擇為中間立場者，其對未來結果的評估不同的人，對太陽花運動的支持度呈現顯著差異：預估被統一者有百分之四十支持太陽花，預估獨立者為百分之五十一，預估維持現狀者為百分之二十八。（圖六）

選擇獨立者支持太陽花運動不難理解。但是，「中間立場，預估被統一者」，同時支持太陽花運動的比率有四成，雖然低於總體分析樣本的平均支持率，但仍顯著高於「中間立場預估維持現狀者」。這個統計關聯性如何解釋？以我們目前的研究資料，尚無法提出決定性的解答。不過，如果把調查發現放到政治情境中檢證，則可以提出一種詮釋：人們因為擔心臺灣的「現狀」維持不住，而選擇支持太陽花，甚至直接參與占領行動。換言之，拒絕統一的人（不論是選擇獨立或中間立場），因為擔憂「被統一」，而在國家遭逢政治危機時，願意採取行動，抵抗「被統一」的趨勢。這個心理機制，雖然不能解釋所有支持或參與太陽花的人，但至少能夠解釋一部分人的心理狀態，他們並沒有坐困於理想與現實的鴻溝，聽天由命，而願意挺身而出。

綜合而論，關於臺灣民意對中國因素相關的態度變化，可以得到以下總體圖像：

（一）政黨因素（包括中國因素化的政黨因素）、中國因素、統獨選擇，是支持太陽花運

動的關鍵變項。

(二) 近年來，年輕人支持臺獨比率升高，以及年輕人對太陽花運動的高度支持，可能凸顯一個現象：一個以臺灣認同為根底的青年政治世代正在興起之中。

(三) 儘管選擇統一者是少數，但是臺灣社會瀰漫的「被統一」的焦慮感，可能在重要的政治時刻產生很大的政治張力，並激發集體行動。

以上兩節以量化資料呈現太陽花支持者面貌以及近年來快速變動的政治認同。但需注意，太陽花運動中的青年文化，也展現了認同政治難以量化的一面，例如前述「罵幹論述」的豐富內涵。計量研究累積不少對臺灣認同議題的認識，但這些知識的積累主要放在相對靜態的「模型」與「框架」中詮釋。這類知識有其必要，但認同政治不只是「調查資料」與「統計數據」的算數而已。雖然從調查中，我們獲知青年世代關於國族認同與其他議題態度的比例，但「數字」中人們認同內容的動態與複雜度，需要更多深度訪談來補充。

## 七、太陽花運動的效應與影響

太陽花運動爆發迄今將近兩年，談論這場運動的歷史性後果，為時過早。但我們可以從這波抵抗行動觀察它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第一、公民不服從與抵抗：占領行動擱置了服貿協議，讓該協議的利弊得失，攤在陽光下接受檢驗，並促使更多公民思考服貿相關議題。若沒有青年們驚天一擊的占領行動，服貿協議現在大概已付諸執行。國民黨政府強欲通過服貿，使馬英九總統的統治正當性受到高度質疑。占領行動揭露了國共合作的壟斷性質：馬總統任期內迄今(二〇一六年三月)與中國政府締結二十三項協議，性質上為國共黨對黨合作下的產物，公民社會沒有置喙餘地，甚至連反對黨也插不上手。跨海峽政商集團不但壟斷兩岸經濟交流的利益，也腐蝕台灣的民主根基。學者主張，占領行動凸顯憲政危機或統治合法性危機；占領行動是人民行使「公民不服從」，也是行使「抵抗權」<sup>27</sup>；公民們行動訴求「國民主權者」<sup>28</sup>；而這個公民運動也創造了「憲法時刻」。<sup>29</sup>

第二、公民社會成為兩岸互動中的行動者：此運動將「中國因素」端上檯面，北京不得不面對臺灣公民力量的崛起，它原先得心應手的「收買策略」也受到牽制。這場運動可能催

27 張嘉尹，〈保衛共和國！——三二八學運的憲法學詮釋〉，《臺灣法學雜誌》二四五，二〇一四，頁六十一。

28 陳嘉銘，〈這是一場公民「收回」國會的行動〉，獨立評論@天下，二〇一四。參見：<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229>。

29 黃丞儀，〈公民運動創造的憲法時刻〉，獨立評論@天下，二〇一四。參見：<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03/article/1145>。

生新的兩岸談判準則。這場運動也讓國際社會理解進行中的兩岸互動模式，在臺灣造成的經濟和政治弊害。參與者清晰表述：「我們不反對與中國往來，而是主張人民有權利參與兩岸關係的決策。」太陽花運動的衝擊，也讓北京認識到加強對臺灣青年世代統戰工作的必要。

第三、北京「收買臺灣」策略遭到挫敗：前文已經闡明，由於臺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北京通過培養「政治代理人」與「在地協力者」的方式，對臺灣發揮作用力；然而，太陽花運動衝擊了這個影響力機制，讓人們「看穿」其中策略。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所說：「中國為了追求兩岸統一，一直很有耐性地採取將臺灣經濟與其掛鉤的策略。這種做法過去似乎很有效，現在卻受到嚴重挫敗。」<sup>30</sup>

第四、同一地緣政治結構下的抵抗運動協力：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之下，香港與臺灣同處在中國因素的氣旋中，近來，「臺灣香港化」的說法頻仍出現<sup>31</sup>。兩地的政治抗爭行動，在運動形貌上呈現「同形化」(isomorphism)，在抗爭對手的指認 (identification of rival)、運動修辭構框 (framing)、抗爭劇碼 (repertoire) 等面向上，浮現相似性。<sup>32</sup>本來香港預定於二〇一七年選舉特首，但民主運動者認為北京不願意讓香港人民享有真正普選權，質疑中共藉著操縱提名辦法而排除民主派候選人，因此於二〇一三年初發起占領中環運動。二〇一四年八月底，中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了香港普選框架，被占中運動者認為是「假普選」，九月下旬，大學生與中學生展開罷課；九月底，「占中」提前引爆，並演變為「遍地開花」的多地

點占領，被稱為「雨傘運動」。港臺公民抵抗運動在同一個地緣區域中相互激盪、傳遞靈感、模仿學習的作用不容小覷。

第五、加速促成政黨輪替：占領運動之後，國民黨政府在人民心目中一落千丈，原本被國共合作邊緣化的民進黨迅速重回政治牌桌。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九合一」地方選舉，國民黨慘敗，而被認為是「兩岸政商權貴」代表的連戰兒子連勝文在臺北市長選舉也以懸殊差距落選。接著，在二〇一六年一月的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中，民進黨除了在總統選舉獲勝，更首次掌控立法院多數。甚至可以論證，這是臺灣啟動民主化以來，第一次明確的政黨輪替。<sup>33</sup>太陽花運動促成了「民進黨時刻」的來臨。

30 「美學者：學運讓中國統戰策略嚴重挫敗」，《蘋果日報》，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黎安友的原文表達是：In working for unification with Taiwan, China has pursued a patient strateg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strategy seemed to be succeeding, but now it has encountered a serious setback.

31 台灣新社會智庫編，《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臺北：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二〇一二。

32 吳介民，〈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港公民抵抗運動〉，謝政論、高橋伸夫、黃英哲編，《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平》，臺北：前衛，二〇一四，頁一三〇—一四四。

33 二〇〇〇年民進黨陳水扁只以相對多數當選總統，其當選主要是國民黨內部分裂，產生兩組人馬競爭的結果。

## 八、結語

本文從「臺灣公民社會抵抗中國因素」的角度分析了太陽花運動爆發的前因後果。「到太陽花之路」，是一個漫長、累積多年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必須放在地緣政治、兩岸關係政治經濟架構、臺灣國內政治局勢變遷、以及臺灣社會的認同變遷等諸多因素之中，才能清楚檢視。

在太陽花運動之前，臺灣最重要的抵抗中國因素的公民集體行動，可說是反媒體壟斷運動。但這不代表，反媒體壟斷運動只有抵抗中國因素的動機，它還包括「不反中國因素」的反資本壟斷層面。同樣的，太陽花運動也不只包含反中國因素的單一動機。從反中國因素的線索切入，將兩個運動做比較，可以看到：太陽花運動對北京「收買臺灣」策略的揭發力道，更甚於反媒體壟斷運動。從這個角度看，太陽花運動激活了公眾對中國因素複雜面向的覺知，並採取集體抵抗行動。

過去多年來，臺灣社會經常瀰漫一種詭譎的「反動論述」：不管我們怎麼反抗，都動搖不了中國巨大的影響力，因此我們不如什麼都不做，免得白費力氣；與其白費力氣，不如參與到中國崛起的趨勢中謀求個體利益。這是赫緒曼所說的「無效論」之反動論述<sup>34</sup>，也是一種自我挫折的命定論。

然而，從反媒體壟斷到太陽花運動，我們觀察到人的實踐與能動性，確實能夠帶來轉變，不論這個轉變在短時間內，顯得如何微不足道。不妨反思，如果沒有反媒體壟斷運動阻擋旺中集團的媒體通路併購案，如果沒有諸多公共評論揭發臺灣媒體報導的「中國化」而使之論述失效，那麼在太陽花運動時刻，主流媒體是否會一面倒地反對、批評這個運動？同樣的，如果沒有學生的占領行動，服貿協議可能已經生效，而北京的經濟統戰策略也不會被攤在陽光下檢視。失敗主義經常是思考疏懶與逃避責任者的避風港；我們從太陽花運動中重新看到實踐的主體性帶來的嶄新視野和力量。

儘管根據學者的「理論預測」，「結構」的力量難以跳脫，但是我們觀察到過去二十多年的兩岸經貿依賴關係，其實相當成分是北京刻意「搭建」的。一個結構關係被建構起來，便處在不斷結構化的過程，可能面臨「拆解」或解構（deconstructing）的力量。「結構關係」如同「意識形態教化」，也需要被分析、被看穿，之後才能誘發人的能動性。

太陽花運動是少數鬆動「結構力量」的時機。年輕世代直率的「臺獨告白」，將臺獨去污名化，還原其作為一種價值選擇本應具有的地位，讓人看到一種反抗的美感（參見本書

34 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吳介民譯，《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臺北：左岸文化，二〇一三。

林秀幸對「太陽花的美學與政治實踐」的討論)。

太陽花運動是對佩里·安德森和約翰·米爾賽默兩人之命定論的挑戰。一個命題可能導致人們不行動，而使之成真。人們如果根據安德森和米爾賽默的預言而不積極抵抗，臺灣在未來若干年內，的確可能被中國兼并，那便是「自我實現的預言」。但一個命題也可能激發人們的行動意志，而使之預測失誤。假如人們根據兩人的預言而積極抵抗，而且臺灣終究保持著獨立自主的地位，那便造成兩人「預言的挫敗」。

本文作者之一曾提出「中國因素侵蝕臺灣民主」的命題<sup>35</sup>。做為社會科學學者，希望預言成真，可以維護學術聲譽；但做為公民，卻希望這個命題最後被證實是錯誤的，並且是因為人們積極採取行動而推翻這個命題，那正符合我們對人的主體能動性的殷殷期待。

35 吳介民，〈中國因素與臺灣民主〉，《思想》十一，二〇〇九年二月，頁一四一—一五七。

#### 參考書目

中文

田島真弓(二〇一五)。「太陽花學運的物質資源籌措機制：社交媒體與社會資本」，「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廿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三十日。臺北：中央研究院。

江昺齋(二〇一五)。「空間·掙扎與權力展演」，收錄於晏山農等，《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一八運動全記錄》。臺北：允晨文化。頁一五四—一九七。

吳乃德

一九九三，〈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七十四，頁三十三—六十一。

二〇〇五，〈愛情與麵包：初探臺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臺灣政治學刊》九(二)，頁五—三十九。

吳介民

二〇〇九，〈中國因素與臺灣民主〉，《思想》十一，二月，頁一四一—一五七。

二〇一四，〈「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港公民抵抗運動〉，謝政論、高橋伸夫、黃英哲編，《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平》。臺北：前衛。頁一三〇—一四四。

二〇一六，〈政治ゲームとしてのビジネス：台湾企業の政治的役割をめぐって〉(做為政治賽局的商業活動：臺商的政治角色)，收錄於園田茂人、蕭新煌編，《チャイナ・リスクといかに向きあうか：日韓台の企業の挑戦》(如何面對中國風險：臺日韓企業的挑戰)。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吳介民、廖美(二〇一五)。「從統獨到中國因素：政治認同變動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台灣社會學》二十九，頁八十九—一三二。

吳叡人(二〇一五)。「黑潮論」，「重構台灣——太陽花的振幅與縱深」研討會，台灣教授協會主辦。臺北。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四、十五日。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著·王超華譯(二〇〇四)。「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五十五，

頁二二五～二四二。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二〇一〇)。〈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林峯燦、吳鴻昌、湯志傑(二〇一五)。〈後冷戰格局下的太陽花運動：談太陽花運動的歷史性與世界性〉。「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廿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三十日，臺北：中央研究院。

張嘉尹(二〇一四)。〈保衛共和國！——三一八學運的憲法學詮釋〉，《臺灣法學雜誌》二四五，頁六十一。

梁秋虹(二〇一五)。〈肖像。沒有臉孔的人〉，收錄於晏山農等，《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一八運動全記錄》。臺北：允晨文化。頁二六七～三二五。

陳婉琪、黃樹仁(二〇一五)。〈立法院外的春吶：太陽花運動靜坐者之人口及參與圖像〉，《台灣社會學》三十，頁一四一～一七九。

陳嘉銘(二〇一四)。〈這是一場公民「收回」國會的行動〉，獨立評論@天下，參見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229>。

曾柏文(二〇一五)。〈太陽花運動的論述軸線〉，「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廿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三十日，臺北：中央研究院。

黃丞儀(二〇一四)。〈公民運動創造的憲法時刻〉，獨立評論@天下，參見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03/article/1145>。

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吳介民譯(二〇一三)。《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臺北：左岸文化。

台灣新社會智庫編(二〇一二)。《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臺北：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

英文

Anderson, Benedict (2001). "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ern Nationalism: Is there a difference that matters?" *New Left Review* 9, May-June, pp.31-42.

Mearsheimer, John J. (2014). "Say Goodbye to Taiwan," *National Interest* (March-April). Internet version: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say-goodbye-taiwan-9931>

Szu-chien Hsu, 2015. "The China Factor and Taiwan's CSOs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The Case of Democratic Front against the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DFACSSTA)". 「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廿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三十日，臺北：中央研究院。